

新式標點

漢學師承記

國學研究叢書之一

劉勰撰



漢學師承記

標點者 凌善清

上 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緒言

(一) 小引

(二) 漢宋學史略

(三) 漢宋學異同

(四) 清學與漢宋學

(五) 江著漢學師承記評略

(一)

這部江藩著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包括三部份：

(1) 國朝漢學師承記

(2)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3) 國朝宋學淵源記

(1) 是正記，(2) (3) 是附記，這是梓行時原來的分法；其實，除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爲蒐集漢學師承記傳中所載諸家撰述可附於國朝漢學師承記之外，國朝宋學淵源記儘可不作附記而與國朝漢學師承記並時對立。

江藩是純粹的漢學家，他著此書，原有一貫的宗旨的。其子江鈞在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後小識中有幾句話，實足以代表著者全副精神的所在。

著錄之意……凡有……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不著錄。

這部書是以經師爲中心的，其價值，(1) (3) 可等諸各史中的儒林傳，(2) 可等諸各史中的藝文志和經籍志，何況他還拿純粹漢學家的資格，運用他的師法家法來記載他們所謂的家學呢！

(一一)

現在，將漢宋學作一簡單的敘述，以期於讀本書前，先得一整箇的概念，再來衡

景江氏所作究竟是怎樣。

中國研究經學的學者，向有所謂漢宋兩派。通常總以爲漢學起於漢，宋學起於宋的。其實不然。在兩漢以前，講學者已經有兩種不同的學派，顯現着分歧的趨向了。阮元說：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

『德行』與『六藝』卽爲後來漢宋學的分水嶺。論語：

據於德，……遊於藝。

於『德』曰『據』，於『藝』曰『游』，已經重於其間了。荀子：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精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

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

曰「數」曰「義」卽是「致知」「明理」的說法。而味其語意，學者在當時傾向於義理的方面，尤爲顯著。處於這種偏於義理之學極嚴厲的時代，那名物訓詁的漢時的學問，怎會產生的呢？方東樹說：

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肆暴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禁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不興，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沒矣。

在古籍蕩然無存的時代，專講「經之用」是不行的了，故一變而爲「文字之學」。這於中國經學史上爲一極大轉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當時班固就說：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這種論調，已足以代表當時一般學者專守章句的流弊。即使有徐幹的『大義爲先，物名爲後』改革的呼聲，也無濟於事了。歷魏晉六朝，因政亂及胡禍的關係，學者也無暇及此，差不多一直要到唐時的義疏之學興，把漢儒的經注重復注過，漢學才顯明的中興起來。皮錫瑞說：

唐人義疏其可議者，誠不少矣；而學者當經籍淪亡之後，欲存漢學於萬一，親鄭君之藩籬，舍是書無徵焉。

觀此，可知唐人義疏之學，祇好說有功於漢注，對於經文，卻只是偶然的附帶提及，而不是有心的專意闡明。所以唐人義疏學，確爲純粹的漢學——東漢的章句之學，是毫無疑議的了。當時，又有經說一派，如啖助、趙匡、陸淳等，各自論說，不相

統攝，』與墨守傳注的義疏派不同，這種懷疑的精神，後經宋儒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子靜的努力運用，宋學的基礎，纔正式確定。章學誠說：

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

所謂『末學忘本』即指漢以後研究注疏者而言。皮錫瑞說：

前漢今文說，專明微言大義；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

則宋學之興起，對東漢及漢以後，原爲經學上一大改革；對西漢及漢以前，卻又是一種復古的運動了。（前漢經學，有方東樹說的『得之屋壁，得之淹中，得之宿儒之口授』的區別，『得之屋壁』和『淹中』者，是要詳『章句訓詁』的；『得之宿儒之口授』者，不過講明『微言大義』，本無所謂『章句訓詁』。此派勢力，在當時不大。）歷經元明，雖自身又有程朱派陸王派的不同，然其以宋學爲立足點，蓋初無二致。凡一學派，斷無一成不變的，矯枉於此，必過正於彼，宋學雖爲挽救

『末學忘本』而起，不久也漸趨於腐化。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黃宗羲以祖國淪落，鑒於宋學末流的空虛，遂別創宗經一派，力矯斯弊。顧氏說：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

黃氏說：

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

『宗經』之說，在顧黃的初意，原爲重振宋學而發，只是於宋學未有裨益，卻做了漢學復活的嚆矢，如惠棟等的崇拜經師，遵守古訓，排斥宋學，愈趨極端。

以上漢宋學兩派之簡單的鳥瞰，可將其重要的意義，約列於下：

(1) 漢宋學雖確立於漢宋兩代，但在漢以前，已早有『義』與『數』兩派分歧的趨向。

(2) 在漢以前，學者大都側重於「義理」的方面——似今日所謂之宋學。

(3) 漢學的產生，純係時代使然，假如秦始皇不焚燒經籍，則漢學之不能產生，決非過言！

(4) 宋學之正式成立，對東漢及漢以後的章句之學爲革命，對西漢及漢以前之義理一派爲復古。

(5) 顧黃宗經一派，重振宋學，結果，反使漢學復盛而宋學衰落。

(三)

漢學與宋學，究竟有什麼異點？我想誰都知道漢儒稽名物，宋儒明心性的，但這不過是表面的不同而已！漢學謹師承，宋學貴心得，纔是兩派的根本差異處。四庫全書提要敘：

……詰經之說，……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

受，遞稟師承，非唯話訓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爲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援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材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各學抒心得，及其弊也肆。

簡單分起來，不外謹師承貴心得兩種。阮元曾說：

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

宋儒於心得所在，卽『排斥經師舊說以爲不足信，』不謹師承，更無所謂家法，阮氏的話，直是不懂宋學而又懂透了宋學。

漢學既爲謹師承，稽名物，我們知道，師說之不可更易，名物之不可意解，其必然

發生的現象，就是根據『實事』。宋學明心性，貴心得，本是一種形而上的學問，沒有根據可言，眞理所在，卽脫略舊聞舊說，唯在自我的『求是』。兩派固各有其長處，只是流弊，也很多。宋儒並非絕對不稽名物，漢儒並非絕對不明心性的。倘漢儒單是謹師承，未免『務實』而太不顧『是非』。宋儒單是貴心得，未免『求是』而太抹殺『實事』了。宋學的好處，在創獲，其弱點在空虛；漢學的好處，在謹嚴，其弱點在勦說。則宋學之可取，原在其懷疑求是的精神，而不在其鄙棄證據專任理智的方法；漢學之可取，只在其根據實事的方法，而不在其曲殉師說薄視理解的精

神。

某時代的學問，有可以代表某時代的特性的，其唯一的要素，就是創作。好比：西周的經學，東周的子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無不含有創作的素質，也無不可代表各該時代的特性。講到漢學，就不是這樣的了；牠是時勢造成的英雄，對於已焚的經籍，從灰燼中檢出來，做一番整理的工作，負一種保存的

責任，不，只是零碎的整理，殘缺的保存。我並不怪那些老師宿儒的不能整箇底整理，全部的保存；整箇底整理，全部的保存，還只是整理與保存而已。他們若有創造的天才，超拔的識見，去另闢途徑，有所新發見，或者中國的學術界，將改頭換面的重見別相，也未始不可能；所謂漢以後的漢宋學派之消長和二千年來此膠彼葛的紛爭之無謂，都是附帶牽連的事。退一步說，即整理與保存之外，也還儘可以從事於新的創獲新的發見的，祇曉一味兒抱殘守缺，認爲是終生的盛事偉業，鬧得學術界死氣沈沈，成了一片殭屍，這樣，還有什麼特性的可言呢？

(四)

根據上面『漢學無特性』的話，那末，清代的講訓詁者，不就是『一邱之貉』了麼？關於此點，清代的訓詁學家是否即爲漢學，還是疑問！儘管閻百詩惠元溪……一流人的旗幟是恢復漢學排斥宋學，我們總不能相信他們所攻擊的即是純粹的漢學而與宋學絕無因襲的關係。龔自珍曾在與江子屏牋上說：

大著……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不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
賈其說。夫讀書者，一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不
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

「本朝自有學，非漢學」這話最值得注意。按清代學術上最佔勢力的有兩派，
一爲吳派，一爲皖派，吳派的首領是惠棟，皖派是戴震。這兩派勢力雖均等，但代表
清代的學問的皖派，其治漢學卻不及吳派的純粹。看惠棟說：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
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
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
經古義一書……

其謹師承與守家法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所以王引之說：

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

因「謹師承」「守家法」而至於「曲殉師說」「是古非今」「實事」是根據了，但無心於「求是」故此派實爲漢學嫡系，可一線貫串下來。再看戴震說：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傳會。

所謂「空所依傍」正是不依傍師說來傳會之意，並非不重「實事」。江藩記戴震有這幾句：

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

「考」而能「辨」正是皖派勝過吳派地方，以宋儒懷疑「求是」的精神，來驅策漢儒根據「實事」的方法，取兩派的長處，熔爲一爐——也唯有將兩派的長處，合併起來，才愈見其真。「實」愈覺其真。「是」這是皖派的命脈所在，決非漢宋兩派中任何一派可及。故代表有清一代的學問的是皖派，而代表時代特性的，也便是考證學——大聯盟的考證學。可知誤以清學爲漢學者，只是看到表面相似的方法而沒有顧及根本懸殊的精神的緣故。

(五)

關於本書的好處，在小引裏已略加陳述，但同時也應得要注意下列的兩點：

(1) 著者江藩，是純粹的漢學家，他站在漢學的立場上說話，門戶之見，當然是不免有的，附記國朝宋學淵源記所列諸儒，固有表示不滿者，即顧廣、二大師，以有『深入宋儒之室』的嫌疑，也幾遭排擠。

(2) 江藩在當時，是惠棟的嫡派，他想把吳派奉為正統，故不惜自亂其例，將戴震等皖派人物拉攏進來，以鞏固自家的壁壘，對抗宋學，大有清學即漢學之概，龔自珍不甘心，叫他改國朝漢學師承記為國朝經學師承記，在我們看來，直是『違心之談』了！

一九三〇，五，九。

江藩傳

(錄自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江藩字子屏，號鄭堂，江蘇甘泉人。少受業於惠松崖江叔灃，余古農。博綜羣經，尤熟於史事。性不喜唐宋文，每被酒，輒自言文無八家氣。時目爲狂生，作河賦數千言，典麗雄偉，可以上方郭景純江賦，人爭傳錄焉。嘗蓄善本書萬餘卷，歲飢盡以易米。繪書集圖志，咸四方名宿題詠，殆徧撰高宗詩集注，由韓城王相國杰進呈，恩賞御製詩文集，復諭召對，值林爽文陷臺灣，報至，遂輟，落魄而歸，飢驅至粵，阮文達延修通志，書成，修脯累千金，隨手揮霍，略盡。凡以布衣而爲掌故宗者，垂二十年。蓋少爲方聞士，且生於典籍之區，乾隆朝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上下齟齬，萬聞千睹，因勒成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受，清代經學之源流，瞭然可考。又成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儒撰述之專精漢學者，仿唐陸氏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成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